

文学史话语的历史诗学论纲

颜水生

(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 贵州贵阳, 550025)

摘要: 文学史编撰作为一种话语实践, 包含阐释模式、修辞结构和情节结构等诗学形式。所有的文学史编撰都不可避免地显示出难以消解的意识形态成分, 意识形态立场必然影响文学史编撰的语言结构、情节模式和阐释模式。文学史话语中存在机械论、有机论、决定论、相对论和形式论等几种主要的阐释模式, 中国文学史写作的话语传统在不同阶段或环节呈现出隐喻、换喻、转喻、提喻、讽喻等转义形式的变换。文学史家大都会表现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 诸如激进主义、启蒙主义、革命主义、国家主义和理想主义等。神话体、喜剧体、浪漫体等情节编排模式在文学史话语中也都有表现。

关键词: 文学史话语; 历史诗学; 语言结构; 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 I209

文献标识码: A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1)05-0166-09



文学史话语是在中国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而成长的历史过程中因文学史编撰活动所形成的包括文学史著作、文学史理论、文学史写作方法等在内的整体性实践过程。“文学史是一种规制宏大的文学理论批评体式”^[1], 在20世纪中后期, 西方学者试图运用“范式”(paradigm)或“话语”(discourse)理论来研究文学史编撰活动。比如德国学者姚斯在《文学学范式的改变》和《类型理论与中世纪文学》等文章中把美国科学史家库恩的“范式”(paradigm)理论和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话语”(discourse)理论结合起来, 创造性地提出“文学史范式”和“文学史话语”概念。又如德国学者古姆布莱希特在《文学史——消失的总体性片断》中提到“文学史话语”这个术语, 他主张利用“话语技术”融合文学史写作, 认为文学史话语具有相对独立性, 但又不是绝对自主的, 文学史话语应该与其他学科话语相互联系。古姆布莱希特在姚斯的基础上, 不仅把“文学史话语”概念具体运用于文学史研究, 而且深化了

“文学史话语”的理论内涵。实际上, 姚斯和古姆布莱希特都是在福柯理论意义上阐释“话语”(discourse)概念, 他们都认为“话语”(discourse)是包含说话人、受话人、文本、语境等要素的完整整体。本文也是在福柯理论意义上对文学史编撰活动进行话语分析, 着重把文学史话语“作为系统地形成这些话语所言及的对象的实践来研究”^{[2](53)}。文学史在20世纪逐渐摆脱了以往的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倾向, 文学史也被看作是想象的作品, 具有当代史和思想史的属性, 这些都为文学史话语的结构研究和修辞分析创造了条件。陈国球和王德威等学者都认识到文学史话语的想象属性和修辞特征。陈国球认为, “‘文学史’的书写不乏个人想象和记忆”^{[3](240)}, 有特色的文学史往往都是个人阅读和集体经验的结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陈国球把文学史看作是民族传统的想象形式。他在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既看到青春恋歌的怀想, 又看到民族主义的承担, 还看到了文学史家建构内心的乡土记忆和

收稿日期: 2020-05-08; 修回日期: 2020-06-2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文学史写作话语研究”(18FZW019)

作者简介: 颜水生, 湖南衡阳人, 文学博士, 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 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中国现当代文学, 联系邮箱: yss8811@126.com

“中国想象”。王德威把文学史写作看作是一种话语论述，认为“历史的编纂论述毕竟也是一项‘创作’行为，有其难以规避的想象层面”^{[4](311)}。由此看来，想象成分和结构属性是文学史话语不可忽视的历史诗学(the poetics of history)特征。所谓“历史诗学”在本文是指“关于历史的‘诗性’(poetic)问题的理论”，即研究历史编撰的“转义性、文本性、创造性、虚构性、审美性以及意识形态性等”^{[5](13)}，具体到文学史编撰来说，它包括文学史话语的阐释模式、修辞结构和情节结构等诗学形式。

一、话语实践与阐释模式

文学史话语实践研究改变了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引发了文学史研究的历史化转向。众所周知，以福柯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思想家大都反对大写的历史和历史的总体化，他们认为观念史、科学史、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等学科已呈现出有悖于以往历史学科的研究方法，强调这些学科的注意力应该转向历史的断裂性、偶然性和差异性。福柯认为在学术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转向中，只有恢复自古就有的知识考古学方法，才能真正摆脱以往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束缚，历史研究应该把对思想史的研究转向对话语实践的研究。在福柯的思想中，知识考古学是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研究对象是“话语本身，即服从于某些规律的实践”^{[2](152)}，研究目的是确定话语的特殊性，确定话语实践的类型与规则，话语可以进行语言分析，也可以进行陈述分析。由此可见，话语实践在知识考古学中无疑是最为关键的环节。知识考古学引发了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变革。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多次提到文学史，他把文学史看作是与观念史、思想史、哲学史、科学史等相并列的学科，也多次提到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马拉美等作家，以及《奥德塞》《人间喜剧》《尤利西斯》等作品。福柯还进一步在知识考古学中探讨了文学史研究方法，认为知识考古学方法其实可以看作是一种历史化方法。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和话语实践理

论对中国文学史编撰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北京大学学者李杨就运用知识考古学理论进行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李杨着重反思以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为代表的文学史写作模式，主张对文学史进行考古学研究和话语实践分析。李杨在对文学史话语的考古学研究中，强调文学史话语的问题化、知识化和历史化，追问文学史话语为什么产生及如何产生，反对文学史写作中的价值判断。虽然李杨的理论倡导引发了争议，但是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在世纪之交的转型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事实，从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到吴秀明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等文学史著作都体现了这种转型。

文学史话语实践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学史研究的认识论，文学史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叙事性的阐释活动。自福柯以后，话语实践理论在历史学和文学研究领域都发挥了重要影响。在新历史主义思想家海登·怀特看来，历史话语可以被视为一种阐释，历史话语所生产的东西可以被视为历史学家对过去信息和知识的阐释。阐释可以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从简单的编年史写作或常见的事实罗列一直到高度概括、高度抽象的历史哲学，所有历史编撰的共性是它们都把“一种再现的叙事模式当作理解作为独特‘历史’现象的指涉物的根本”^{[6](294)}。历史阐释是叙事化的，而叙事无疑是一切历史编撰的主导模式，因此，所有关于历史话语的理论都必然会“涉及在历史文本的生产中叙事性的功能问题”^{[6](295)}。由此可见，文学史编撰也不可能全部包纳事实，文学史家必须阐释他们所掌握的过去的材料和数据，并借助推断或推测来填补这些材料和数据信息中的空白，“必须对他的材料进行阐释，以便建构出各种形象的活动模式，用以反映历史过程的形式”^{[7](55)}。正是从这样的理论出发，美国学者杰诺韦塞在《文学批评和新历史主义的政治》中试图把话语实践理论由历史学引入文学研究。杰诺韦塞认为话语实践理论的优点是将历史视为一种独特的理解模式，把历史视作一种文类、一种特殊的本文(text)，历史是一种描述过去事件的方式。文学史话语是历史话语的重要类属，一种文学史话语形式必定生产一种叙事性

阐释活动,文学史话语再转换成文学史本文(text),文学史本文(text)反过来成为哲学或批评反思的对象。于是形成文学史研究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已经成为过去的文学史活动或事件,也就是文学史家研究的客体对象和文学史编撰活动,最终形成文学史家关于文学史客体对象或文学史编撰活动中的书面话语;另一方面是文学史学,也就是研究文学史客体对象、文学史编撰活动与文学史话语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在文学史话语实践中,阐释也必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阐释也可以看作是文学史编撰的重要目的。

文学史话语实践研究改变了文学史的方法论与认识论,也为文学史的阐释结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在杰诺韦塞看来,历史必定是有结构的,并且都遵循一种模式或结构,同时“结构制约着本文的写作和阅读”^{[8](58)}。话语实践结构为阐释模式的建构提供基础,比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提到话语实践的阐释视角。又如怀特认为阐释至少以三种方式进到历史编撰学,即审美方式(叙事策略的选择)、认识论方式(解释范式的选择)和伦理方式(意识形态策略的选择)。此外,怀特在《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揭示了历史编撰中的形式论、语境论、有机论和机械论的阐释模式。再如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分析了文学研究中的精神分析、神话批评、符号学、结构主义等多种阐释模式,并建构了马克思主义阐释学的理论与方法。虽然福柯和怀特一直避免使用“结构主义”,并希望与“结构主义”划清界限,但是他们的思想与方法对文学史的结构研究的影响仍然不容忽视。从阐释模式方面来说,在文学史话语中存在机械论、有机论、决定论、相对论和形式论等几种主要的阐释模式。机械论的阐释强调文学史发展的规律性和绝对性,试图建构文学史发展的规律,并把这种规律看作是普遍的和永恒的,文学史只不过是某种规律的证据而已。怀特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把泰纳看作是机械论阐释的代表。从这个方面来说,可以把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和《白话文学史》等文学史著作看作是机械论式阐释的代表。有机论阐释在文学史编撰中强调文学史发展的因果关系和历史脉络,诚如怀特所

说,有机论策略的核心在于对微观/宏观关系范式的形而上学分析,试图将文学史中的细节描述成综合过程的部分,倾向于谈论原则或观念,并把这些原则或观念看作是文学发展的目标或本质。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和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等文学史著作可以看作是有机论阐释的范本。决定论阐释不仅注意因果关系,而且认为因果关系决定文学史发展的结果,老舍等人草拟的《〈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以及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是决定论阐释的代表作品。相对论阐释注重文学史发展的相对性,并且“努力以一种现象的相对整合取而代之”^{[9](26)}。相对论阐释重视文学史发展与历史背景、社会心理、文化实践和精神状况的关系,把文学事件置于历史情境中,揭示文学现象与特定历史情境下发生的事件之间的关系。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和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等著作就是这种相对论阐释。形式论阐释把文学史发展简化为形式的历史,把文学史话语看作是审美话语,把描述文学的生动性、独特性和本质性作为核心目标,在文学史编撰中注重形式研究和审美判断。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林庚的《中国文学史》、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和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无疑是形式论阐释的样本。

二、语言结构与修辞模式

历史著述永远都无法离开语言,文学史编撰也无法脱离语言。语言本身有自己的术语形式和结构模式,语言形式总是包含修辞手段,没有修辞手段,语言本身也难以存在。在文学史编撰中,文学史家总是通过一定的语言形式来编织文学史的面貌,他们在有意或无意中必然会使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形式和修辞手段,文学史研究有一套专门的语言形式和规则,这与历史编撰没有什么不同。在《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中,福柯揭示话语与语言的关系,他认为话语不是语言而是陈述,话语不能还原为语言但又离不开语言。福柯主张破除语言的神圣化,认为必须对话

语进行修辞学研究才能充分揭示话语的连贯性和整体性。其实，历史写作被看作一种修辞工作是法国思想的传统，以《历史批判辞典》著称的法国思想家培尔和以《风俗论》传世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都认为历史话语运用了修辞技巧。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历史编撰学被看作是修辞学的一个分支，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到瑞士文化史家布克哈特等历史学家“至少具有一种修辞的自觉性”^{[7](136)}。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说，福柯继承了法国思想的修辞传统，这种思想对包括文学史在内的历史学科产生了深刻影响，文学史话语也必然包含语言结构和修辞策略等虚构技巧，文学史写作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修辞工作。

文学史话语的修辞研究一直是西方学术的重要传统。1725年，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在《新科学》中就用“想象的类概念”分析早期人类的思维特点，以“诗性”规定人类早期文学的特征。维柯对荷马的描述充分发挥了想象力的作用，也充分借鉴了比喻的修辞手法。1863年，泰纳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创造了“一种讽刺性的历史主义的修辞法”^[10]。20世纪末，新历史主义思想家特别重视历史话语的修辞学研究，比如怀特认为转义(tropic)在人文科学话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转义是话语的灵魂”^{[7](3)}，没有转义机制，话语不仅不能正常运行，也无法实现其目的。在怀特看来，话语构型的原型情节包括隐喻(metaphor)的描写、换喻(metonymy)的解构、提喻(synecdoche)的再现和反讽(irony)的反思四个阶段。这种转义机制不仅反映了人类意识的一般过程，而且与现代修辞理论相互对应，话语转义机制与修辞学、诗学、辩证法、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一直存在关联。黑格尔、马克思、皮亚杰和弗洛伊德都持有类似观点。新历史主义关于历史话语的修辞研究也经常运用到文学史话语研究，美国学者托马斯就认为“‘历史’(history)一词常被嵌入我们关于文学历史(histoire)的话语之中”^[11]。在文学史话语的修辞分析中，比喻理论无疑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受重视的。维柯在《新科学》中认为比喻是“一切原始的诗性民族所必用的表现方式”^{[12](183)}，他把比喻分为隐喻、换喻、

转喻(trope)和讽喻(allegory)四种类型。他认为一切比喻都是具有本源意义的思维方式，比喻形式不仅是用来阐释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神话、传说和寓言，而且“是用来描述古代社会结构特征的模式，还是用来把古代社会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联系起来的图式”^{[7](223)}。在《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中，怀特从语言学角度探讨比喻理论在传统诗学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把隐喻、转喻、提喻和反讽看作是传统诗学和近代语言理论中四种基本的比喻类型。在对斯特劳斯、雅各布森和拉康等学者的分析中，怀特强调比喻理论为历史想象研究提供了“一个对其深层结构的形式进行分类的基础”^{[9](42)}。怀特深受维柯《新科学》的影响，他把维柯关于人类由神圣时代到英雄时代再到人的时代的演变过程的观点运用到历史学研究之中，认为历史话语传统的发展也是“从人们对历史世界的隐喻式理解，经由转喻式或提喻式理解，最后转入一种对一切知识不可还原的相对主义的反讽式理解”^{[9](51)}。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比喻理论成为文学史话语研究的方法论，同时为文学史话语研究提供了结构模式。

文学史话语的修辞属性也是中国学术的重要论题。1936年，朱自清在为林庚《中国文学史》所写的序言中就明确指出，“著者用诗人的锐眼看中国文学史”，“更用诗人的笔写他的书”，“他写的是史，同时要是文学，要是著作也是创作”^{[13](3-4)}。朱自清认为林庚在文学史著作中进行了发挥，有许多独到见解，尤其是给每章以新颖的题目来暗示问题的核心。也就是说，朱自清在林庚的《中国文学史》中看到了文学史的修辞属性。又如陈国球在《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中分析了林庚的《中国文学史》、柳存仁的《中国文学史》和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等著作中的修辞结构和叙事体例。陈国球深受新历史主义理论的影响，他在著述中多次引用怀特的观点，运用新历史主义理论分析文学史写作的特点。陈国球把林庚和司马长风的文学史著作视为抒情结构的范本，把柳存仁的文学史著作视为叙事体结构的样本。陈国球分析了林庚的《中国文学史》的修辞属性和语言特征，认为林庚在文学史写作中大量运用譬喻，比如女性文艺、男性

精神和少年精神等譬喻,认为“林庚以譬喻为论述的重要模式,其中包含丰富的想象力,可以开拓读者的思维空间”^{[3](133)}。正是从这些因素出发,陈国球称赞林庚的《中国文学史》具有“新颖的格局、漂亮的辞藻”^{[3](138)}。陈国球的研究无疑为文学史话语的语言和修辞研究提供了重要经验。

从修辞模式方面来说,借鉴自维柯到怀特以来的比喻理论来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文学史写作的话语传统在不同阶段及不同环节呈现出隐喻、换喻、转喻、提喻、讽喻等转义形式的变换。首先,隐喻无疑是文学史话语中最为常见的修辞形式,也是最受维柯赞赏的比喻形式。隐喻就是“用以己度物的方式”,“使无生命的事物显得具有感觉和情欲”“让一些物体成为具有生命实质的真事真物”^{[12](180)}。在怀特看来,隐喻是指在事物相互间的相似性或差异性中寻找类比。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和德国哲学家尼采被看作是以隐喻模式进行历史著述的代表。在文学史编撰中,林庚无疑是运用隐喻的重要代表。林庚在《中国文学史》中把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看作是民族精神的发展过程,以“启蒙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夜时代”隐喻对历史发展和民族精神的看法,认为中国文学史是中华民族追求光明的过程。林庚大量使用了朱自清所说的“暗示”,“借助神话的语言来喻示他的观察”^{[3](108)},如《诗经》“仿佛是这民族最古老的一声歌唱”^{[13](23)},“是中国创造的童年,便带有童年的健康与喜悦”^{[13](25-26)}。这样富有诗意的语言、富有才情的修辞在林庚的文学史著作中比比皆是,因此朱自清认为林庚“将文学的发展看作是有生机的”^{[13](2)},他用“以己度物”的方式使文学史获得了激情和生命力。此外,在黄人的《中国文学史》、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陆侃如和冯沅君的《中国诗史》以及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等文学史著作中,隐喻也是最为常见的修辞模式。其次,换喻也是文学史话语的重要修辞形式。一般看来,换喻可以理解为部分代整体或整体代部分,换喻是从事物的外在性中寻找联系,怀特由此认为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是运用换喻的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学家。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和《白话文学史》中,胡适用换喻的修辞形式使

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再次,提喻在文学史话语修辞形式中也不可忽视。维柯在《新科学》中没有分析提喻,而怀特把提喻看作是转喻的一种形式,认为提喻是以部分来象征假定内在于整体的某种性质。兰克是典型的运用提喻的历史学家。从这个方面来说,赵家璧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钱理群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等文学史著作无疑是提喻式文学史写作的典范。《中国新文学大系》各集导言就以新文学来象征中国文学的启蒙性和现代性,以启蒙主义来代替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质。此外,转喻在文学史话语修辞形式中也占有重要地位,虽然维柯和怀特对转喻的理解不一致,但是他们都认为提喻揭示了行为主体与行为结果的因果关系。维柯强调转喻是以行为主体代表行动。怀特把现象分为行为主体和行为结果两个方面,认为转喻的还原可以采取由行为主体到行为关系或因果关系的形式,转喻中的“现象世界必定为假定存在于现象世界背后的一大群行为主体和行为方式所占据”^{[9](47)}。马克思是以转喻模式为史学进行哲学辩护的历史学家。从这个角度来说,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蔡仪的《中国新文学史讲话》、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以及唐弢、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著作都可以说是转喻式文学史写作的范本,这些文学史著作都强调无产阶级领导(行为主体)在文学史发展(行为结果)中的决定性作用。最后,讽喻也是文学史话语修辞的重要类型。一般看来,讽喻倾向于消解一切意识形态行为,试图超越意识形态,讽喻“往往造成一种文明自身处在‘疯狂’之中的信念,并且针对那些寻求以科学抑或艺术的方式把握社会实在之本质的人,产生了一种保守而清高的蔑视”^{[9](50)}。讽喻式陈述的目的在于“暗中肯定字面上断然肯定或断然否定的东西的反面”^{[9](49)},怀特由此认为布克哈特和克罗齐是运用讽喻模式为史学进行哲学辩护的历史学家。从这个意义来说,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丁帆的《中国新文学史》等文学史著作可以说是讽喻式写作的样本。陈思和、陈晓明、丁帆等学者

极力反对以往政治化和阶级论的文学史写作，他们以鲜明的态度否定以往文学史著作的意识形态化和单一化模式。这些著作由于对纯文学观念的倡导，体现了审美主义的美学追求，从而在美学策略上实现了为理想主义辩护的目的。

三、意识形态与情节模式

意识形态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在著述中多次提到了意识形态概念，他们强调意识形态是人类思维的一般产物，认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思想家有意识地完成的过程”^{[14](483)}。后来，阿尔都塞、伊格尔顿、威廉斯、杰姆逊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都对“意识形态”(ideology)概念进行了阐述。比如威廉斯认为“意识形态”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被普遍地视作“纯理论的制度”^{[15](269)}。又如伊格尔顿在《美学意识形态》中把美学看作是一种与现代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密不可分的意识形态话语。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出发，文学史话语无疑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意识形态立场决定文学史的阐释模式、语言结构和情节模式。德国社会科学家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区分了意识形态的类型，怀特简化了曼海姆的观点，提出了四种意识形态立场，并将之用于历史话语研究。在文学史著作中，文学史家的意识形态立场往往决定文学史写作的面貌，文学史家大都会表现出不同的意识形态立场，诸如激进主义、启蒙主义、革命主义、国家主义和理想主义等。激进主义的典范有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钱基博的《中国文学史》、胡怀琛的《中国文学史略》、顾实的《中国文学史大纲》、傅斯年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等；启蒙主义的典范包括赵家璧的《中国新文学大系》、钱理群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等；革命主义的典范有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等；国家主义的典范有黄人的《中国文学史》、张炯的《中华文学通史》、刘登翰的《台湾文学史》《香港文学史》等(新中国成立以后兴

起的少数民族文学史编撰都可以看作是国家主义的典范)；理想主义的典范有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教程》、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丁帆的《中国新文学史》等。

文学史著述的情节模式无疑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马克思论证了“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16]，而怀特把历史编撰的叙述方法称之为“编织情节”。怀特认为：“‘编织情节’是从时间顺序表中取出事实，然后把它们作为特殊情节结构而进行编码，这同福莱所说的一般‘虚构’的方式一模一样。”^[17]加拿大学者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试图“建立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法”^[18]，他认为人类文学的叙述结构是对自然界春夏秋冬季节循环的模仿，文学叙述结构呈现喜剧、浪漫故事、悲剧和反讽及讽刺的循环。弗莱对文学结构形式的揭示无疑对历史学的结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怀特对弗莱观点的引申充分说明历史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的密切关系。怀特正是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理论中概括出历史著作的情节编排模式，比如浪漫的、悲剧的、喜剧的和讽刺的情节编排模式。在文学史研究领域也是如此，文学史著作也都存在着不同的情节结构模式。

从情节编排模式方面来看，虽然弗莱和怀特强调的悲剧模式没有出现，但他们概括的神话、喜剧、浪漫模式在文学史话语中也都有表现。在文学史著作的情节编排模式中，神话体无疑是一种带有起源意义和普遍性质的结构模式，维柯、斯特劳斯、弗莱、巴特及怀特分别从哲学、人类学、文学、语言学和历史学角度为文学史叙事的神话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在维柯看来，神话是想象的类概念，神话既是语言的起源，又是历史叙事的起源，神话的历史使人们能够认识时代的特点，也使人们能够找到“凡俗世界史中的各种起源”^{[12](63)}。在《野性的思维》中，斯特劳斯认为一切历史叙事都具有阐释性，且所有历史著作的阐释也都具有神话性质，他认为“一部清晰历史应该承认，它永远不能完全避开神话性质”^{[6](72)}。在《批评的剖析》中，弗莱把神话看作是文学结构的总原则，其他文学结构只有通过神话意识才能发挥作用。在《神话修辞术》中，

巴特把神话看作是一种言说方式,神话凭借形式和概念与历史相交融,“神话负有的责任就是把历史的意图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19](203)}。神话意识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中一直潜在地发挥作用,文学史家在历史叙事中不仅建构自己的文学史观念,也在不断地神话自己的文学史观念,神话意识也就演变成一种神话修辞术。如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把白话文学神话化,并以之作为批判文言文学的武器;赵家璧在《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将启蒙神圣化作为指导原则;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把审美观念本质化、神圣化并作为批判政治化写作的武器。在这种修辞术中,神话仍然是一个想象的类概念,它通过想象或联想讲述文学发展的进程,并且赋予文学史家神圣的命名功能。虽然神话修辞术讲述的不一定是文学发展的事实,但它仍然具有不可忽略的意识形态价值,正如巴特所说:“神话在形式上是最适合于意识形态颠倒性的工具。”^{[19](203)}文学史家通过文学史叙事建立一种历史神话修辞术,他们“将现实世界转变成想象世界、历史转变成自然的活动过程”^{[19](202)}。神话修辞术体现的是一种颠倒的想象,启蒙知识分子操纵这个颠倒过程,神话掏空具有历史性质的文学事实,最终使“世界作为本质的和谐景象从神话中产生出来”^{[19](203)}。喜剧体无疑也是文学史著作中情节编排的重要模式,喜剧体往往会表现进步力量与反对力量的冲突,进步力量在一般情况下都战胜了反对力量。启蒙知识分子把社会、历史、语言和文学叙述成不断进化的过程,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胡适重点讲述白话文学与文言文学、活文学与死文学的激烈冲突,并强调白话文学必然取代言文文学的历史趋势。谭正璧的《中国文学进化史》和胡云翼的《新著中国文学史》、凌独见的《新著国语文学史》等文学史著作也都运用了这种喜剧体模式。浪漫体模式在文学史著作中也是一种典型的情节模式,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陆侃如和冯沅君的《中国诗史》、袁行霈的《中国古代文学史》、陈思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都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情怀。中国文学史写作还呈现出另外两种特殊模式,即传奇体和寓言体。传

奇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传统,文学史写作继承了这种叙事传统,比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等。寓言体在历史著作和文学史著作中也是普遍存在的模式,正如杰姆逊认为第三世界的本文(text)都可以当作民族国家寓言来进行阅读,历史叙事不仅可以看作是“神话”,也可以看作是“寓言”。所谓“寓言”,即“在表达一事物时意味的却是另一事物”^{[6](152-153)}。叙事性叙述总是一种寓言的叙述。诸如黄人的《中国文学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林庚的《中国文学史》等文学史著作都可看作是一种寓言式写作。林庚的《中国文学史》虽然偏重抒情体结构,但它仍然可以被看作是民族国家寓言,因为林庚始终把文学发展与中国发展结合起来,“中国文学”其实也就是“文学中国”。

四、结语

文学史编撰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包含阐释模式、修辞结构和情节结构等诗学形式,这些诗学形式代表文学史著作的形式层面。但形式层面必然无法脱离内容层面,意识形态蕴涵在文学史编撰中,并占据不可忽视的地位,所有的文学史编撰都不可避免地显示出难以消解的意识形态成分,意识形态立场必然影响文学史编撰的语言结构、情节模式和阐释模式。在维柯、福柯、弗莱、曼海姆、杰姆逊和巴特尤其是怀特思想的影响下,本文区分了激进主义、启蒙主义、革命主义、国家主义和理想主义等意识形态立场,概括了文学史编撰中的神话体、喜剧体、传奇体、寓言体、浪漫体等情节模式,分析了文学史话语中的换喻、提喻、隐喻、转喻、讽喻等修辞结构,辨析了文学史话语中的机械论、有机论、决定论、相对论和形式论等阐释论证模式,见表1。

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史话语是一种流动性极强的实践活动,文学史话语必然随着社会发展和文化变迁而不断变化,因此,本文的共时性和结构主义研究虽然充分证明了文学史话语作为历史诗学的属性和特征,但也有可能遮蔽了文学史

话语的历时性和内在矛盾性，比如当下流行的网络文学、科幻文学、非虚构文学就已经给以往文学史话语边界带来了强烈冲击。显然，本文的研究是策略式的，上述区分并没有绝对的、明晰的界线，文学史话语的语言结构、修辞模式、情节模式和阐释模式也并非泾渭分明。

表1 文学史话语的历史诗学模式

意识形态模式	阐释模式	修辞模式	情节模式	著作举例
激进主义	机械论	换喻	神话体	胡适《白话文学史》
启蒙主义	有机论	提喻	喜剧体	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
革命主义	决定论	转喻	传奇体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
国家主义	相对论	隐喻	寓言体	黄人《中国文学史》
理想主义	形式论	讽喻	浪漫体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参考文献：

- [1] 王春宇. 鲁迅与中国现代文艺理论批评话语系统之建立[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64(3): 35-53.
WANG Chunyu. Lu Xu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ry theoretical criticism[J]. Journal of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9, 64(3): 35-53.
- [2] 福柯. 知识考古学[M]. 谢强, 马月,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FOUCAULT.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M]. Trans. XIE Qiang, MA Yue.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 [3] 陈国球. 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CHEN Guoqi. The writing form and cultural politics of literary history[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 [4] 王德威. 想象中国的方法: 历史·小说·叙事[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6.
WANG Deiwei. Method of imagining China: History,

- fiction and narration[M]. TianJin: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2016.
- [5] 张进. 历史诗学通论[M].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3.
ZHANG Jin. General theory of historical poetics[M]. Guangzhou: JiNan University Press, 2013.
- [6] 海登·怀特. 后现代历史叙事学[M]. 陈永国, 张万娟,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WHITE H. Postmodern historical narratology[M]. Trans. CHEN Yongguo, ZHANG Wanjua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3.
- [7] 海登·怀特. 话语的转义——文化批评文集[M]. 董立河, 译. 郑州, 北京: 大象出版社, 北京出版社, 2011.
WHITE H. Tropics of discourse: 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M]. Trans. DONG Lihe, Zhengzhou, Beijing: Elephant Press, Beijing Press, 2011.
- [8] 伊丽莎白·福克斯-杰诺韦塞. 文学批评和新历史主义的政治[C]// 张京媛.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52-66.
FOX-GENOVESE E.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politics of new historicism[C]// ZHANG Jingyuan. New historic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3: 52-66.
- [9] 海登·怀特. 元史学: 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 陈新,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
WHITE H. Metahistory: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M]. Trans. CHEN Xin. Nanjing: Yilin Press, 2013.
- [10] 弗兰克·林特利查. 福柯的遗产: 一种新历史主义? [C]// 张京媛.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144-159.
LENTICEHIA F. Foucault's legacy: A new historicism? [C]// ZHANG Jingyuan. New historic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3: 144-159.
- [11] 布鲁克·托马斯. 新历史主义与其它过时话题[C]// 张京媛.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67-94.
THOMAS B. The new historicism and other old-fashioned topics[C]// ZHANG Jingyuan. New historic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3: 67-94.
- [12] 维柯. 新科学[M]. 朱光潜,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VICO. New science[M]. Trans. ZHU Guangqia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ress, 1986.
- [13] 林庚. 中国文学史[M].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04.

- LIN Ge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M]. XiaMen: Lujiang Press, 2004.
-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6.
- 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ume 4[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66.
- [15] 威廉斯. 关键词: 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 刘建基,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M]. Trans. LIU Jianji.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6.
- [16] 赵家祥, 唐昆雄. 从抽象到具体——《资本论》的叙述方法[J].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9(6): 1-19.
- ZHAO Jiexiang, TANG Kunxiong. From abstract to concrete: The narrative method in *das capital*[J]. Journal of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019(6): 1-19.
- [17] 海登·怀特. 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C]// 张京媛. 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160-179.
- WHITE H. The historical text as literary artifact[C]// ZHANG Jingyuan. New historicism and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3: 160-179.
- [18] 姚文放. 生产性文学批评论纲[J]. 扬州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23(1): 5-15.
- YAO Wenfang. An outline of productive literary criticism[J]. Journal of Yangzhou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9, 23(1): 5-15.
- [19] 巴特. 神话修辞术: 批评与真实[M]. 屠友祥, 温晋仪,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 BARTERS. Mythologies: Critique and truth[M]. Trans. TU Youxiang, WEN Jinyi.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An outline of historical poetics of literary history discourse

YAN Shuishe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As a kind of discourse practice, literary history compilation includes poetic forms such as interpretation mode, rhetorical structure and plot structure. All literary history compilation inevitably shows ideological elements which are difficult to be resolved. Ideological position will inevitably affect the language structure, plot mode and interpretation mode of literary history compilation. There are several main modes of interpretation in the discourse of literary history, such as mechanism, organicism, determinism, relativism and formalism. The discourse tradi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writing presen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taphor, metonymy, trope, synecdoche, allegory and so on at different stages or links. Most scholars of literary history show different ideological positions, such as radicalism, enlightenment, revolutionary-ism, nationalism, idealism, and so on. Plot arrangement modes of mythology, comedy, romance and others modes are also reflected in the discourse of literary history.

Key Words: historical poetics; literary history discourse; language structure; ideology

[编辑: 胡兴华]